

爱国名人故事丛书



爱国教育家的故事

苏中立 主编

马相伯	黄炎培	吴贻芳	王亚南	徐特立	陈鹤琴	李向忱
蔡元培	邓初民	俞庚棠	马相伯	黄炎培	吴贻芳	王亚南
熊希龄	晏阳初	杨秀峰	蔡元培	邓初民	俞庚棠	马相伯
张伯苓	陶行知	成仿吾	熊希龄	晏阳初	杨秀峰	蔡元培
徐特立			陶行知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爱国名人故事丛书

爱国教育家的故事

苏中立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相伯

陈鹤琴

熊希龄

蔡元培

吴贻芳

苏中立

熊希龄

俞庚棠

徐特立

张伯苓

杨秀峰

黄炎培

徐特立

成仿吾

邓初民

黄炎培

李向忱

王亚南

邓初民

陶行知

吴贻芳

晏阳初

陈鹤琴

王亚南

陶行知

蔡元培

吴贻芳

12875
5450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国教育家的故事/苏中立 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5

(爱国名人故事丛书)

ISBN 7-5622-1560-X

I. 爱…

II. 苏…

III. 爱国教育家—故事

IV. G414

爱国教育家的故事

◎ 苏中立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照排中心排版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0)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咸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汪凌华

封面设计:蔡跃华

责任校对:李沛

督印:方汉江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75 字数:130千字

版次:1996年5月第1版

1996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622-1560-X/G·759

印数:1—5000

定价: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王建农

我们的爱国主义是积淀在龙的传人血脉中对祖国最深厚的感情，是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在中华民族 5000 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对促进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近现代以来，更是群星灿烂，诞生了一大批伟大的爱国主义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军事家和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在他们的身上，凝聚和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高尚品德和精神风貌。弘扬他们的高尚品德和爱国主义精神，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是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的

共同基础,是全社会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从湖北的实际出发,继出版《荆楚魂——湖北 100 位爱国名人》后,又隆重推出《爱国名人故事丛书》,包括《爱国将领的故事》、《爱国文学家的故事》、《爱国科学家的故事》、《爱国教育家的故事》、《爱国民主人士的故事》、《爱国华人的故事》六种。我对这套丛书的出版感到由衷高兴,并对他们为湖北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所付出的辛苦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套丛书,从内容到形式,都独具特色。它不是全面地去介绍每一位杰出爱国者的生平业绩,而是着力去写他们一生中最闪光的亮点,用优美平实的语言,向青少年朋友讲述他们的爱国故事,读来感人肺腑,催人奋进,为我省及全国广大青少年朋友提供了新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今年是“九五”规划的第一年。新春伊始,江泽民同志就在与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同志座谈时强调指出:“各级党委要充分看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性,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切实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进一步把‘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

优秀作品鼓舞人’贯彻落实到宣传思想战线的各项工作之中去,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提供有力的保证。”

作为宣传思想工作重要阵地的出版社,一定要贯彻江泽民同志的指示精神,讲政治、讲大局,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的方向,增强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后代负责,多出鼓舞人的优秀作品,多出有地方特色的优秀作品,多出深受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

我希望,在“九五”期间,我省有更多的优秀作品出版。

在这套《爱国名人故事丛书》付梓之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同志约我写序。寒冬将尽,新春将临,正是孕育希望的季节。我相信,我省和全国的广大青少年读者,一定能从这套丛书中,获取营养和启示,获取继续前进的力量,获取我们伟大事业必定胜利的坚强信念,以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去迎接美好的 21 世纪。

1996 年 1 月 26 日

自 隸

马相伯 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 (1)
蔡元培 学界泰斗 人世楷模 (14)
熊希龄 幼幼及人之幼 生生如己所生 (30)
张伯苓 创办南开 廉洁奉公 (44)
徐特立 现代圣人称颂久 德高望重公堪当 (60)
黄炎培 手脑并用 敬业乐群 (82)
邓初民 红色教授 壮心不已 (93)
晏阳初 世界伟人 思国怀乡 (106)
陶行知 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 (120)

陈鹤琴	童心母爱育儿童	报国求真轻生死	(138)
吴贻芳	智慧女神	冰清玉洁	(151)
俞庆棠	为民教育献青春	遗像清高化后人	(164)
杨秀峰	高风亮节	楷模永垂	(178)
成仿吾	惟希万代后来者	远胜从前开路砖	(192)
车向忱	追随左右皆桃李	只为从前苦耕耘	(211)
王亚南	鸿篇巨著	芳名永留	(229)

马相伯

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

马相伯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学识渊博的学者，拥护维新的改革者和永垂青史的爱国者。他心忧天下，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时至暮年，仍然壮心不已，因而被誉为“爱国老人”，“百岁青年”，“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爱国教育家的故事

“我学法文，是为中国用的”

马相伯又名马良，原籍江苏丹阳，1840年4月19日生于丹徒（今镇江）的几代天主教徒之家。11岁那年，就开始讨厌在私塾里读书，对老先生们教授的东西不感兴趣了。他想了解外面的世界，非常渴望能学到一些新知识。为此，他整日愁眉不展，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正在他冥思苦想之际，突然一个念头冒出来：为什么不去上海呢？早就听大人们说起那儿有很多新式

学校，可学的东西非常非常多。这一念头好像黑暗中划过一道闪电，令他豁然开朗。起初他还想征得父母同意，可转念一想，上海离家那么远，自己又是个孩子，父母知道了，肯定不会答应的。于是，他瞒着家人，偷偷地一个人上了路。

1851年冬，马相伯到了上海，比较顺利地进了法国人办的天主教会学校——依纳爵公学（后改名徐汇公学）读书，在那儿，他用的名字叫马斯臧。公学里开设了很多他从未接触过的课程，这对充满好奇心的马相伯来说，无疑像磁石吸铁一样吸引着他，他非常努力，经常是废寝忘食。有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不仅学会了拉丁文和法文，就是数学和天文学也学得不错，尤其是法文，他学得特别棒，谈吐自如，发音纯正，听他说话，简直就像一个法国人在说话一样。当时的校长是意大利人，叫晃德莅，他常常称赞马相伯了不起，将来肯定有所作为。马相伯的父母开始因为他的不告而别很生气，后来看到马相伯在公学里的确能学到许多新知识，并且态度认真，成绩又不错，心中的怒气也渐渐平息下去了。第二年，他们还把马相伯的弟弟马建忠也送到这个学校读书。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马相伯已18岁了。当时，正是英法联军侵华之时，英、法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看着广大人民在痛苦

中挣扎，马相伯义愤填膺，心里恨透了侵略者。恰在这时，上海的法国领事听说他精通法语，派人来请他当领事馆的翻译，马相伯闻听此言，更是怒火中烧，不待对方把条件谈完，便愤然作色，义正辞严地说：“我学法文，是为中国用的。”字字如千钧之石，掷地有声，来人只得灰溜溜地回去了。

毁家兴学

晚清时期，国家日益衰败，世界列强屡屡入侵，使马相伯产生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他的这种思想更加突出了，他认为，不读书，就不能够救国；不研究深邃科学，更不能够救现在的中国。因此，他渴望能创办一所大学。

1899年马相伯60岁时，曾一度退出政坛，隐居在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当时蔡元培正执教于南洋公学，与他的居住地很近，并常常向他讨教拉丁文。1902年11月，南洋公学的学生不满学校当局的专制压迫，200余人高呼“祖国万岁”，集体退学。这些学生一部分转入后来创立的爱国学社，另一部分由蔡元培介绍到马相伯那儿求学，他爽快地答应了，同时也更坚定了他创办大学的决心。但考虑到个人办学，势单力薄，难以持久，也由于他本人笃信天主教，对教

会有一定的信任，便决定依靠耶稣会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夙愿。于是他毅然将松江、青浦两地的3000亩家产捐给教会作为办学的基金。

马相伯家境本来并不是十分富有，他父亲是个中医，经常在乡间巡回为贫苦农民治病，所得收入极其有限，勉强养家糊口。后来开设中药铺和米、布店，日子逐渐有了起色，但至多也只是中等人家。那时马家并无田产，后来的田产都是马相伯的长兄马建勋购置的。马建勋曾充当李鸿章的幕僚，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担任淮军粮台官，他趁战乱之机，在金台、青浦、松江一带圈购了一批田产。因他没有子女，故将遗产分作三部分，其中一部分赠送给了马相伯，这也是马相伯为创建震旦学院所捐出的财产的来源。

1903年3月1日，这座凝聚着马相伯全部心血的学校终于成立了。学校被定名为震旦学院，“震”字是“泰”字谐音，“旦”为早晨，“震旦”意为“中国之曙光”，普普通通的名字实际上寓有深意。马相伯希望通过这所学校，使人才辈出，为国所用，挽救日衰的中国，使之重振雄风，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1905年，马相伯退出震旦学院，但他对学院的发展仍然十分关心。1908年，震旦学院准备在法租界建设新校舍，向马相伯募捐，马相伯又一次慷慨解囊，为震旦购买卢家湾地基100

亩(当时地价每亩400元),共捐现洋4万元,又毫不犹豫地献出上海英、法租界房地产8处,约值现洋10余万元。马相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广胸怀,为了祖国的强盛、人民的幸福,不惜毁家兴学,拳拳之心,人所共仰。

震旦风波

震旦学院在马相伯的悉心经营下,卓有成效地发展着。到了1905年,已办了3年的震旦学院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马相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感到莫大的欣慰。他描绘着震旦今后发展的蓝图,希望把震旦办成世界一流的大_学,让震旦的学生掌握先进的知识,将来好报效祖国。

可就在这时,他因操劳过度,病倒了。起初他仍然坚持工作,可耶稣会中的一些伪善份子,装出一付关切的样子,力劝马相伯住院养病,马相伯因拗不过他们,便暂时撇开了公务。但他没有注意到耶稣会正在酝酿着夺权的阴谋,妄图把震旦控制在教会手中。其实教会对震旦学院不传授宗教知识早就耿耿于怀,常常借故不派教员来校上课作为要挟;再加上当时反清呼声很高,震旦学院也成了革命人士的一个根据地,他们四处活动,广泛宣传,被清政府视为眼中

钉。于是清廷一再与租界巡捕房联系，要逮捕学院中的反清志士。为了使震旦得以维持，更为了保护这些有胆识、有作为的青年学子，马相伯不只一次地拖着病躯去与教会磋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马相伯同意由教会派一名神甫来校主持校务工作。神甫掌权后，“尽废旧章，别定规则”，把学校的民主传统、科学精神一一抛弃，妄图改变学校性质。学生们见此情形，极为愤慨，他们不愿意被训练成外国的奴才，为抵制教会的干预，遂一致决定全体退学。他们摘下学院的牌子，将图书、器材和标本等搬出学院。

此情此景，真令马相伯百感交集。他虽信奉天主教，但他更是一个中国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因此他决不依附于教会。学生们的爱国精神在他的心中产生了共鸣，为了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他虽病魔缠身，仍然与学生并肩战斗，一道退出震旦。

不久他又开始考虑复校办法，并得到当时的社会名士严复等人的赞助，在清廷两江总督周馥的协助下另建新的震旦学院。可正在此时，法国徐家汇天主教堂抢先宣布震旦学院于七八月间开办。于是，新校不能再用“震旦”这个名字了，马相伯只得改校名为复旦公学，取恢复震旦、复兴中华之义，并被公推为校长。1905年中秋节，复旦公学正式开学，该校即后来复旦大学

的前身。

复旦公学的诞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收回教育主权的一个胜利。在马相伯的领导下，复旦公学继承并发扬了震旦学院的优良传统，不断发展壮大，日渐成为东南沿海地区反清革命和救亡运动的重要基地。

斥责汪精卫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一夜之间踏遍了整个沈阳城，我国东北顿时陷入灾难之中。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凡是不甘受辱的中华儿女，都纷纷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这一年，马相伯已是92岁高龄，但他那片浓浓的爱国之情丝毫没有衰退，心忧天下的赤子之心一点也未改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丧心病狂地残杀中国同胞，侵吞中国土地；目睹可敬的华夏儿女“以血荐轩辕”的悲壮事迹；再看看蒋介石统治当局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气愤不已，遂和熊希龄等60余人于1931年底组成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发表宣言和通电，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与全国人民一道抗击外侮。他振臂高呼：“对内绝对不准枉费一枪弹；对外不许吝惜一枪弹。”凭着他的崇高威望，他的宣传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国民党统

治当局迫于形势，决定在 1932 年 1 月召开“国难会议”，商讨如何救国。但主持筹备会议的是后来成为大汉奸的汪精卫，他全然不顾各界爱国人士强烈的抗日民主要求，将会议议题限在“救灾”、“绥靖”这样的圈子里。他说：“排除国难就是通过救灾，使人民免于饥饿，通过绥靖，使地方安定。”马相伯十分气愤，说：“大敌当前，国家危在旦夕，不去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怎能谈得上保护人民生活安定？”接着又说：“国难会议不讨论真正的国难，这样的会议有什么意义！”他坚决不与汪精卫合作，与史量才等 66 人联合声明，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汪精卫虽然窝了一肚子火，但慑于马相伯的名声，不敢公开得罪他，便派部下褚民谊到上海找马相伯疏通，要他与国民政府合作，带头参加国难会议。马相伯对褚民谊不予理睬，褚还不死心，引用汪精卫的话说，国难不是国民党必须承担的。没等他说完，马相伯即拍案而起，指着褚民谊鼻子说：“保家卫国，这难道不是政府应负的责任吗？‘九一八’以后，祖国半壁江山沦入敌手，他汪精卫还在推脱罪责，难道不可耻吗？”说得褚民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无言以对，只得怏怏地离去。汪精卫知道自己被斥骂了一顿，对马相伯更是怀恨在心。但马相伯怒斥汪精卫的故事流传开来，却令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齐赞他骂得好！

“惟公马首是瞻”

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主义，招致了严重的后果，不仅东北地区陷入日军魔爪之下，1935年，侵略军进一步扩大事端，制造了华北事变，使整个华北地区也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况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危机，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

马相伯时年 96 岁，但他的心一点也未衰老，爱国激情仍然高涨。他邀约沈钧儒、邹韬奋等文化界爱国人士发起救国运动，并于 12 月 27 日召开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大会，马相伯和沈钧儒等 35 人被推举为执行委员。1936 年 1 月和 5 月，马相伯和沈钧儒等又相继被推选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这些救国会在马相伯和宋庆龄、沈钧儒等人领导下，开展各种形式的救亡活动，推动着抗日民主运动不断地向纵深发展。

马相伯和救国会的抗日活动令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感到十分恐慌。他们一方面对救国会大肆诬蔑，恶言相加，极尽恐吓之能事；另一方面也在暗中策划，准备逮捕救国会的领导人。马相伯毫不畏惧，再一次挺身而出，与宋庆龄、沈钧儒等救国会领导人发表启事，对国民党的卑劣行径进行了淋漓尽致地揭露。